

思考,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儿童思维发展新论作为语文教学跨越式试验的主要理论基础。并且在以上两者的基础上,结合具体教学实践,提出了“主导—主体”教学结构理论、新型建构主义理论、创造性思维理论,建立了本试验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层次整合的主要理论基础。

技术环境与资源: vclass课堂互动教学平台,与各种版本教材配套、按照本课题理论精心设计的优质教学资源,各种课型、知识类型的优秀教学设计方案、综合案例,支持学校校本教研、教师专业发展的网络培训课程。

应用服务支持(模式与方法):为了保障上述成果的应用效果,项目组结合中小学实际构建了一套管理与支持服务机制,包括教学设计指导,现场听评课指导,网络信息服务(课题教学指导信息服务),基于案例的校本教研,年会、区域交流会与现场公开课等。

(选自《“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简介——一对一数字化学习理论与实践创新白皮书》)

(责任编辑:谭焯)

跨越式教育: 跨越的不仅是教育,更是孩子们的人生

文/祝刚

一位泡在小学课堂里的大教授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并领导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生活教育理论,在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生活教育运动。由此观之,一流的教育理念领航教育思潮的深刻变革,一流的教育学者引领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新世纪,面对我国教育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一位蜚声国内外的著名教育技术学家长期关注我国的基础教育,他对我国传统语文和英语教学中的弊端痛心疾首,他对我国中西部偏远地区儿童的教育问题殚精竭虑,他虽已年过七旬,仍常年在祖国各地最需要他的地方奋斗着。他淡泊名利,在国外留学时婉拒了美国大公司的盛情邀请;他不爱忙于各种社会应酬,但谈起教育来,总会神情激动、滔滔不绝。他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的教授何克抗。何教授担任北师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长期从事教育技术理论与应用研究(特别是基于Internet的网络教育应用研究);已培养博士20多名,指导在读博士生12名;先后出版专著6部,主编教材12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00多篇;自1978年以来,先后8次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市科技进步奖,其中特别

奖1次,二等奖5次,三等奖2次,一次获北京国际发明展览金奖,拥有发明专利1项;1992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3年12月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第一位教育技术学博士生导师;1993年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1994年7月入选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第23卷;1997年成为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何教授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教授”,然而,作为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试验的主持人和负责人,他一心扑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改革上,与各位校长和教师打成一片。跨越式教育从2000年开始,每到项目学校,何教授便不顾旅途的劳累与奔波,深入课堂听课,然后与教师评课,与教师一块儿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在宁夏海原县的一所中心小学调研时,该校的校长深情地说:“做教育工作,就要像傻子一样,需要朝爹^①的精神。”教育工作需要的正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而何克抗教授,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有建树,而且以坚韧、执著的精神进行着跨越式教育试验,被西部的教师称为“当代的陶行知”。

为有“创新”多壮志,敢让“教育”换新天

2001年,我国政府通过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这意味着我国开始了第8次全国范围内的课



程改革。然而，课程改革总是伴随着纷争与坎坷。在理论层面，一时之间，“一股轻视知识的思潮”“食洋不化、水土不服”“穿新鞋走老路”“新课程实施走样”的争论充斥于学术界；在实践层面，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新课程改革充满了城市主义倾向——对课程资源贫乏与师资薄弱的偏远农村地区来说，新课程中提出的综合活动课程、校本课程等无异于天方夜谭，加上农村留守儿童偏多、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学生寄宿制问题等，教育公平受到严重拷问。正如吴康宁教授指出，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曲折性、长期性世所罕见，理念与利益、文件与文化、前台与后台、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异与矛盾是导致中国教育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1]

我国教育理论界向来不乏理论的喧嚣，舶来的、闭门造车的、兜售的、自主建构的……然而，理论的繁荣却遭遇着实践贫瘠的尴尬境遇。面对如此多的教育理论，我们的教育实践者仍然有些迷惘、无所适从。目前，我国语文教育主要还是依据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展阶段论，特别是在小学语文教育领域，这一理论已经根深蒂固。该理论将儿童思维的发展划分为四个大的年龄阶段：0~2岁为感知运算阶段，2~7岁为前运算阶段，7~12岁为具体运算阶段，12岁至成人形式运算阶段。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发展的顺序不可改变，因此，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在一二年级主要进行识字教学，从三年级开始进行写作教学。在皮亚杰的经典理论支配下，我国传统语文教育的实际效果总是成为众矢之的，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与口头表达能力总是受到质疑。不少作家与语文教育家纷纷“炮轰”我国语文教育。著名编剧叶开说：“垃圾教材危害胜三聚氰胺！”少女作家蒋方舟说面对高考作文试题，自己也写不出来。由此观之，我们的语文教育已经“病了”，并且病入肌理。语文教育的症结主要集中在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分强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第二，过分强调标准化考试而窒息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第三，过分强调写作技巧的训练而忽视对学生观察力、想象力的培养。^[2]

在步入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今天，皮亚杰在19世纪提出的理论仍能适应今天的教育吗？凯洛夫主张的“复习—导入—讲授—巩固—练习”的五步法教学模式仍旧能机械、僵化地套用吗？^②课堂教学中的“满堂灌”教学模式压榨了多少学生的创造性与积极性？面对诸多的问题，何克抗教授通过严密的教育心理试验，提出了儿童思维发展新论。该理论认为，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儿童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了电视、电脑、图书等各种媒体，因此，儿童在学习自己的母语——语文时，不是零基础，而是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生活

语言和表象。而在传统语文教学中，教师总是依据外语教学的方式，按照“字—词—句—段—篇—中心”的模式进行教学，这样的教学，肢解了语文的整体美，突出了语文的工具性，忽视了语文的人文性。

面对传统语文教学的诸多弊端，何克抗教授在试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儿童创造性思维理论和儿童语觉论。儿童思维发展新论是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批判地继承皮亚杰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的，它为大幅提升我国语文教学的质量（也为大幅提升任一民族母语教学的质量）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和语觉论是大幅提升语文和英语教学质量的主要理论支撑，依据这两项理论进行的教学，儿童的语文和英语成绩得到了质的飞跃：很多试验班的小学生掌握的生字量比同年级的学生要多3 000个，阅读量也有了大幅度提升；不仅口头表达能力得到了提高，书面表达能力也让教师倍感惊喜。在宁夏官桥中心小学调研中，一位小学生写下了如此感人而充满想象力的文字：“我画了个有爱心的太阳，送给玉树的小朋友，让他们重建家园。我画了个透明的翅膀，送给水珠，让它更透明。我画了个笑脸的太阳，送给老师，让老师工作省力。我画了个黑黑的太阳，送给奶奶，让奶奶的白发变黑。”看了这段文字，我不仅被孩子们的丰富想象力所感动，更因为孩子们真挚感情的流露而眼眶湿润。

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保障。同样地，在教育领域中，我们更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这样，我们的才能一扫教育的阴霾与种种异化现象，让教育焕发勃勃生机，为儿童的成长培植一份乐土，源源不断地培养大量的栋梁之才。

墙内开花墙外香——一项鲜为人知的教育试验

从2000年9月在深圳市南山试验学校开始进行“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创新试验”至今已经将近11年，目前试验学校已经发展到全国220多所，其中有国内或省内比较著名的小学，也有生源和办学条件都很差的学校。不仅在北京、广东、浙江等沿海省市，而且在甘肃、宁夏、新疆等边远地区，跨越式教育都已生根开花了。跨越式教育日益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宁夏调研中，我们通过听课，发现很多教师基本都能灵活运用“211”教学模式和“三说两听”教学模式。

跨越式教育在中国的传播真正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借鉴了何克抗教授的跨越式教育试验模式，他们称之为“十分华文”。调研中，我得知新加坡教育部在2007年派代表团到北京和广东实地考察了何教授的语文跨越式教育试验，并邀请何教授到新


加坡对当地的教师进行培训。2008年,新加坡有22个班级参与了跨越式教育试验;2009年,有44个班级参与了跨越式教育试验;2010年,有100多个班级参与了跨越式教育试验;至今,新加坡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跨越式教育。我们还电话采访了新加坡教育部教育科技司助理司长黄利发,他说新加坡的华文教育之所以开展得如此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重视,另一方面是源于树立典型,对教师采取激励措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把促进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然而,我国由于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校际差异等长期的社会和经济原因,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需要走,偏远地区的孩子和大城市的孩子在教育起点公平方面还存在巨大差异。

何克抗教授主持跨越式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我广大地区的儿童接受优质的教育,实现全面的发展。然而,跨越式教育在推广的时候,总是遇到诸多观念、体制、团队力量和经费方面的问题。首先,不少教育工作者在刚接触到跨越式教育的时候,囿于传统,总是认为搞教育应该“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认为搞“跨越式”教育就是揠苗助长,违背了教育规律,是不可取的,因此总是拒斥跨越式教育。其次,不少学校的校长和教师认为,面对我国目前的中考和高考制度,跨越式教育不仅会增加教师的教学负担,而且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校的升学率。调研中我们发现,跨越式教育主要在小学一、二、三年级等低年级进行,在高年级,跨越式教育已然销声匿迹,让位于小升初等各类名目繁多的摸底考试和会考。^①这是跨越式教育在小学中高年级和初中推行遭遇的制度性障碍。再次,跨越式教育团队主要依托的是何克抗教授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因此,跨越式教育团队的成员大都是何教授的同事和他的研究生,总共20多人。面对如此庞大的教育试验项目,并且经常需要到祖国西部一些偏远的地区进行教育试验,他们的人员力量太薄弱,而且每年都有团队成员因为毕业而退出了跨越式教育试验。调研中,一位教师说,何教授有时就像搞“推销”的人员一样,总是跑来跑去,到处推销他的跨越式教育试验。最后,跨越式教育试验,不仅需要一定的教学多媒体设备,还需要配备《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扩展阅读材料》、教学视频等材料,而这些都是需要经费支持。因为教材和阅读材料的有限,学生们不得在放学后将教材和阅读材料交到教师那里,以防止丢失,同时,这些教材还会循环使用,一级一级地传下去。跨越式教育团队在去西部项目试验学校调研的过程中,不仅要自己承担差旅费,而且常常是在火车或汽车上解决自己的午餐或

晚餐。跨越式教育团队堪称是“一个奋斗在祖国最偏远地区的教育研究团队”。

从“书斋”到“田野”——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曾说,以往的哲学家只是解释世界,而关键的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想何克抗教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不仅解释了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被誉为“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何教授以淡泊名利、一心扑在教育上的精神,不仅在教育理论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在教育实践层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鲁迅先生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何教授没有做“书斋式”的学者或正统的“学院派”,他以自己对偏远地区学生美好生活的憧憬,对跨越式教育的执著,身体力行地为儿童人生的跨越搭建了一座桥梁。跨越式教育还在进行,希望有更多的探索者、实践者投身于跨越式教育,给孩子们一个快乐成长的乐园、一个自由呼吸的教育、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注释:

①“朝爹”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傻、固执的意思。

②笔者在此质疑的不是凯洛夫“五步教学法”的合理性,而是质疑教师不知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机械、僵化地运用凯洛夫的“五步教学法”,这样,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变成了一种呆板的、扼杀学生生命力与创造性的教学活动。

③在与宁夏和河北的教师进行访谈中,教师向我们反映现在很多学校还有小升初考试,即使取消了“小升初”的名称,也会变相地以其他考试代替小升初考试。

参考文献:

[1]吴康宁.中国教育改革为什么会这么难[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

[2]何克抗.儿童思维发展新论——及其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2—147.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谭焯)